

# 施密特传

〔英〕 乔纳森·卡尔 著



# 施 密 特 传

〔英〕乔纳森·卡尔 著

李晓东 马灿荣 梅兆荣 译

梅兆荣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Jonathan Carl**

**Helmut Schmidt**

Econ Verlag, Düsseldorf und Wien, 1985

根据西德杜塞尔多夫埃康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罗雪村

**施·密·特·传**

〔英〕乔纳森·卡尔 著

李晓东 马灿荣 梅兆荣 译

☆ 梅兆荣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88毫米32开本 印张：6.5 字数：162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269-9/K·48 定价3.10元

## 译者的话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全能政治家”。他享誉于北德港口城市汉堡，1962年初在一次特大洪灾的抢救工作中显示了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使他一举成为社民党的一颗“新星”。1965年起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7年升任主席，1968年当选为社民党副主席，这使他能够参与该党的重大决策，并在组织该党的议会斗争方面作出了卓著的成绩。1969年秋社民党上台后，施密特在勃兰特政府里先是担任国防部长，后又改任财政部长，他在防务和财政两个方面均有重大建树。1974年勃兰特因纪尧姆间谍案引咎辞职后，施密特很自然地接任了联邦总理职位，登上了仕途生涯的顶峰。直到1982年，他统揽全局在国内和国际均干了一些大事。特别在打击国内恐怖主义活动方面，他也表现了“铁腕宰相”的坚决果断；对北约通过对付苏联SS-20导弹的“双重决议”，以及为对付美国转嫁经济困难而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施密特都起了关键作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施密特同勃兰特和魏纳共同组成了社民党三驾马车式领导核心。在联邦德国，施密特被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军事战略家、权威的国际经济学家、善于雄辩的演说家。施密特在1980年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理后不久，因失去党内强大的左翼力量的支持而不得不于1982年从联邦总理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但施密特在离开政坛以后，仍从事国际政治军事战略和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他撰写回忆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做报告，被喻为联邦德国的基辛格。

施密特1918年出生于汉堡。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

啤酒馆策动未遂政变时，他才4岁。20年代末震撼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爆发时，他才10岁。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过14岁生日。施密特在当时的德国属于这样一代人：要在纳粹上台前形成自己的政治世界观还过于年轻，但他们年龄已足以使他们在1939年被拉去打仗。施密特中学毕业后，便参加了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接着正式服兵役。1937年他被分配到一个防空连，1941年升任为少尉并调往苏联前线，之后调到戈林的帝国航空部供职，最后调往西线，1945年4月溃退时被英军俘虏。施密特26岁时才上大学攻读经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以增补知识。这样的经历使他既不同于比他年纪大5岁的维利·勃兰特，也不同于在“千年帝国”土崩瓦解时才15岁的赫尔穆特·科尔。勃兰特16岁就加入了社民党，希特勒上台后便逃亡国外；科尔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打上参加战争的烙印；而施密特不仅参加了入侵苏联的战争，而且当过希特勒军队的军官。施密特自己曾说过，他当时对希特勒独裁政权是反感的，但他仍相信自己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毫无疑问，这样的经历必然会给施密特的思想形成带来某些特点。

本书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施密特的身世及其政治生涯的各种历程，但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名人传记。本书的特点是夹叙夹议，既有事实，又有分析。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施密特其人，了解他的成长、发展过程，他对国内国际各种重大问题的见解，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促使他形成这些观点的背景和根源，以及他采取的各种行动的动机和效果。应当说，其中有不少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比如他对东西方实力均势和德国统一问题的观点。而由于天下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对施密特的分析介绍必然要涉及与之相关联的人与事，因而也使我们了解到联邦德国各党各派以及国际上政界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从一个侧面介绍了联邦德国国内外政策的演变，颇有参考价值。

## 引 言

在昔日灾难深重的岁月里，施瓦纳维尔德半岛上建有纳粹头目的别墅。这个半岛从柏林城边长满树木的万湖畔伸向湖心。它离帝国的心脏不远，是个理想的休养地。今天，施瓦纳维尔德半岛是自由世界的尽头。从这里乘船只需几分钟，便是标志着西柏林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哨塔和铁丝网。另一边就是波茨坦城。1945年德国投降后，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曾在这里举行高峰会晤。那次会晤是试图为确定战后欧洲秩序而举行的三次会议中的最后一次。接踵而来的是冷战和德国的分裂，16年以后，共产党筑起了柏林墙。

自1974年以来，施瓦纳维尔德是阿斯彭研究所——美国一家私人资助的基金会——柏林分所的所在地，这个基金会定期邀请各方人士前来纵论天下大事。这个地方象修道院一般幽静，周围史迹丰富，但这并没有使人们忘记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严峻的分裂。毫不奇怪，近几年来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曾是多次富有成果的讨论会的场所。但是，其中的一次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在1979年2月那些辛酸的日子里举行的一次，赫尔穆特·施密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应邀出席的政治家、外交官、新闻记者和科学家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这次会晤。施密特当时的威望可能高过任何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他既是防务问题专家，又是经济问题专家，不到一年以前他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赢得了“铁腕宰相”的声誉。此外，这位总理还不无原因地享有“臭嘴施密特”的绰号。一些与会者期望他发表一篇“不供发表”而又

尽人皆知的讲话，把那些他不大看得上眼的政治家狠狠地讽刺挖苦一番。吉米·卡特，这位流年不利的美国总统，极有可能被选为这种讽刺挖苦的牺牲品。

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总理到达时，讨论已全面展开，议题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不事声张地同与会者打了个招呼，便坐下来倾听别人在发言中说些什么。他不时地通过会议厅巨大的全景玻璃窗向外张望，从这个窗口可以眺望到万湖及其远方。当他东一句西一句插话时，不知疲倦的阿斯彭研究所所长谢泼德·斯通不得不要求他：“大点儿声，总理先生！”

许多与会者失望了。他们本是来听施密特演讲的；然而，施密特却倾听他们发言，这使他们受宠若惊，但也感到莫名其妙。他们想，或许总理想把他对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尖锐评论留到晚宴后再讲，因为他曾允诺晚宴后要讲话。然而，他再一次使他们感到出乎意料。

施密特先讲了几个笑话，使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随后他表示想谈谈“欧洲的后天”。他既没有提到苏联的导弹，也未谈及东西方裁军或欧洲共同体的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他却谈起更大范围的、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欧洲，一个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的欧洲，托尔斯泰和契柯夫，肖邦和巴尔托克，一如但丁和莎士比亚，贝多芬和康德，都属于这个欧洲。这种精神上即思想和理想的根本一致，要比大陆的政治分裂更强有力、更持久。障碍虽不会很快消失，但谁也不应当怀疑，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这一过程中，位于欧洲心脏、政治上处于分裂的德国人民也将重新走到一起来（施密特避免使用带有政治副音的“重新统一”一词）。

施密特的讲话，引起了不同的看法，这在第二天的私下谈话中表现出来了。部分听众表示印象深刻。有一位政治家认为这是“连篇空话”，意在给人以总理“也有艺术才能”的印象。他还

补充说，许多名人只要问一下自己，史书将会怎样写他们，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

另一位年纪较大的外交官在午餐时发表了另一种见解。他早就听说施密特内心世界复杂，有艺术家的性格，易感易伤，时常精神抑郁。“铁腕宰相”的形象只有一半的真实。

有人问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从昨晚起，我对这种说法就不感到意外了。任何事情都不会再使我感到意外了。但是，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青年时期与战争····· 1
第二章	初登政坛····· 20
第三章	防务与统一····· 30
第四章	任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 44
第五章	在政府里····· 59
第六章	总理的早期年代····· 87
第七章	总理——走向顶峰（1976—1980）····· 115
第八章	总理——越过了顶峰（1980—1982）····· 165
结束语	····· 197

## 第一章

### 青年时期与战争

“我爱这个城市，爱它那几乎全然坦露的千姿百态；爱它对传统富有庄重的自豪感，爱它那种商人气味的求实主义，也爱它那种使人眷恋的乡土气息。但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爱着它的，因为它在酣睡，我的美人，它在梦想；它为自己的美德沾沾自喜，而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它享受着今日，并认为明天也会是美好的。”

这个城市就是汉堡，德国最大的港口，但谁是那失意的恋人呢？当读者看到1962年汉堡一家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和摘自本篇文章的上述这段话时，许多人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读者们会以为，作者不会是本地人。这种华丽的文风与汉堡人那种典型的含蓄态度是毫不相干的。

他们大错特错了。三年之后，出人意料地真相大白了。这个作者便是汉堡的内务市政委员，一个素以思想敏捷，口舌尖刻，通晓从交通到防务等许多领域的业务而著称的人。

只有很少人料想到他有诗人的细胞。他的名字就叫赫尔穆特·施密特。时隔数年之后，施密特说，为了掩盖痕迹，他故意用这种华丽的文风写作。他想稍稍地唤醒一下汉堡，促使该市利用它的机会，以便在西德的政治中起更大的作用。在他看来，隐姓埋名地发出强烈的呼吁是引起辩论的正确办法。

尽管施密特有种种冷静的考虑，他在这篇关于他的家乡的文章里还是倾注了不少感情。在他坎坷的生涯中，他几起几落，是

汉堡支持和帮助了他。他在这里上大学，在这里成家，又在这里谋得第一个职位。当政治反对党的生活在莱茵河畔的德国首都使他几乎陷入绝境时，他抽身引退，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他为汉堡的世界主义气氛感到自豪，为它作为德国汉莎成员的历史（几百年来汉莎支配着同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感到自豪，也为之作为“城市国家”的作用感到自豪。他当联邦总理时，不得不在波恩接待大部分外国宾客，但是，凡是他所特别尊重的国家领导人，他都把他们请到北德他那所坐落在汉堡朗根霍恩城区的小房子里，这个城区紧靠郊区，离飞机场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汽车路程。

导游手册里很少提到朗根霍恩。这里既没有地处阿尔斯特河附近的帕泽多夫那些漂亮的别墅和高级妇女时装店，也不象在城西布兰克内瑟那样可以眺望易北河的景致。这里稳重的居民富而不奢，其最突出的美德就是不炫耀自己。

前来朗根霍恩走访的风云人物（从苏联国家元首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无不对施密特家乡的城郊田园生活赞叹不已，不能不使其感情溢于言表。他们明白，总理在家里对他们也许更加坦率和无拘无束。在朗根霍恩花园中漫步闲谈、观鱼赏花有助于解决那些在正式场合解决不了的问题。

从朗根霍恩向市中心方向步行半个小时，便来到了总的讲较为粗野的区域，即“红色”的巴姆贝克区。本世纪初，这个市区不仅以工人阶级的堡垒著称，而且也因这里的孩子调皮捣蛋而妇孺皆知，你就是打他们多少次巴掌，他们也不肯听话。如今，巴姆贝克之所以遐迩闻名，倒不如说是因为赫尔穆特·海因里希·瓦尔德马尔·施密特1918年12月23日降生于此。

在这之前一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威廉皇帝退位。但德国仍是统一的，它的军队尚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而它的老百姓已在窃窃私议政治上被出卖，即背后插刀的神话！六个

月后才签订凡尔赛和约，该和约强加给德国人的条件和战争赔偿是他们中许多人感到无法忍受的。德国第一次也是不走运的一次建立民主制的试验——魏玛共和国尚未开始。

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策动那次未遂政变时，赫尔穆特·施密特才4岁。同年，即1923年，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工人领的工资每天要用手推车来拉，整车整车的纸币，在餐馆进餐，饭还没吃完，价格已上涨了。1929年银行大倒闭时，施密特10岁。失业人数突破500万大关时，施密特未满13岁。施密特14岁生日方过一个月，希特勒已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德国人至今还把这一行动错误地称之为“夺权”。一年以后，纳粹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政党被解散，工会被取缔，书籍被拿到大街上焚烧，第一批集中营已建成。

施密特属于这样一代人：要在纳粹上台前形成自己的政治世界观，他们还过于年轻，但他们的年龄已足够使他们在1939年被拉去当兵打仗。维利·勃兰特，施密特的前任，仅比施密特大5岁，但这5年已能构成巨大的差别。勃兰特16岁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加入这个在19世纪下半叶创立的工人运动。希特勒上台时，19岁的勃兰特转入地下，逃亡国外，并在国外一直呆到战争结束。接替施密特任政府首脑的赫尔穆特·科尔，在1945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时才满15岁。许多迹象，其中包括施密特1958年在联邦议院的一次特别辛酸的感情爆发表明，他对自己是他所谓的“夹在两代人中间的一代人”的一员这点，怀有切肤之痛。

施密特的父亲名叫古斯塔夫，他的职业是教师，他对毅力、自制，特别是苦干，推崇备至。这些“普鲁士”的品质未能使他富裕。施密特一家居住在一套有四居室的简朴住宅，但古斯塔夫·施密特坚信，如若无此品德，一生中將一事无成。当他的两个儿子，赫尔穆特和他的弟弟沃尔夫冈还在孩提时，他便向他们灌输这些做人之道。兄弟俩是两个不敢在父亲面前放肆的巴姆贝克

少年，他们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跌倒了，不能哭；得不到表扬，也照样勤勉。

母亲卢多维卡则截然相反。她有艺术天资，常常带着孩子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每周一次请来亲朋，举办家庭歌唱晚会。可是，施密特老师却管教甚严，赫尔穆特在许多年中一直怕他的父亲。一张早年拍摄的已经发黄的图片上，赫尔穆特·施密特站在一群蓬头散发的巴姆贝克男孩子中间。他手持一根棍子，怀抱一个轮子，焦躁不安地看着镜头，好象在等待着挨骂。在后来的一张7岁时的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神情坚毅的男孩子，紧绷着脸，两手交叉，好象准备要同别人争斗似的。

就这样，施密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个性，这些个性曾经帮助他克服了仕途中的种种挫折，攀上了顶峰。而他早年就对音乐和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此外，自10岁起，他有幸上了一所使其个性的这两个方面有发展良机的学校。

利希特瓦克学校(以原汉堡艺术馆馆长的名字命名)是一所提倡自由的学校，几十年后，它的学生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它。这里男女同校，贫富子弟兼收，在教学中让学生的科学知识 with 艺术创作同时得到发展，特别鼓励学生的批判精神和自信心。所以，后来纳粹关闭了这所学校便不足为奇了。不过，这所砖砌的校舍至今还矗立在汉堡市立公园的一侧。

赫尔穆特·施密特从1929年至1937年在利希特瓦克学校上学，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年。他的个子比同龄的男孩要小，因此绰号叫“矮子施密特”。但他以精力和组织能力方面之长弥补身材上的不足。他的学习成绩极佳，其中包括英语口语和笔写。但他没有上法语课，多年之后，他引以为憾。他同吉斯卡尔·德斯坦交谈时用英语，这是两人都掌握的一种语言，虽然施密特要说得更娴熟一些。但同吉斯卡尔的继承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会谈时，施密特不得不借助于翻译了。这样，表面上虽保证了语言的准确性，但影响了谈话的亲密程度。

利希特瓦克学校鼓励学生每年从事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大约在15岁那年，施密特完成了三项。这表现了他的兴趣之广泛。其中一项是详细地调查安特卫普港、鹿特丹港、不来梅港和汉堡港之间的竞争情况；另一个项目是研究文艺复兴在威悉河流域的影响；第三个项目使他成了一个小作曲家，他把20首赞美诗编成了一个四部合唱。

在上学的岁月里，他发展了弹奏钢琴和绘画的天赋。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柏林时，他开始弹管风琴。

施密特还成了一个赛船队的队长。确实，他是一个模范学生，一个全能手！但能否成为一个未来的国务活动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施密特本人尤其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学生时代，他逐渐选定目标，要当一个建筑师，或者最好当一个城市规划师。他喜爱艺术，画得一手好画，但他总觉得难以借此为生。所以，搞建筑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妥协。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抱定这个目标，但情况迫使他走上迥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假设在30年代中，有人站在一群男女学生面前预言说：“尔等之一，即赫尔穆特·施密特，有朝一日将当上政府首脑，”他当时会怎么想呢？

施密特说，“我会想，他在胡诌。”

汉内洛雷·格拉泽尔，昵称“洛姬”，可能也会作同样的反应。她是一个电工的女儿，是施密特多年的同班同学，然而她似乎对这个与她相隔几排椅子就坐的矮小、聪明但相当傲慢的小伙子不曾留意。当他们两人15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们开始调情，关系逐渐加深，但当施密特服兵役时，关系又有些松弛。1941年，他们重新接近，并于翌年结为夫妻。自那以来，他们就不曾分离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情趣相投，都爱好音乐、艺术和文学。而对政治，他们原来似乎无暇顾及。

即使由于他年轻而情有可原，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那个年代里，对政治不闻不问，难道不令人奇怪吗？他的家庭对魏玛共

和国的崩溃和继之而来的专制持何看法？他的父亲可曾在政治上对他施加过影响？

60年代，施密特曾回答过这些问题，他的答复是从那个时代的德国青年口中都能听到的。他说，他的父亲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也不是纳粹。他也没有参加抵抗活动。

“我认为，他一生都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民党和德国民主党之间摇来摆去。但他为人小心谨慎，而他的谨慎可能是有道理的……。我虽受父亲熏陶而朦胧地反对第三帝国，但也不曾赞成过任何主张。”

“当纳粹上台时，”他继续说道，“我对于民主没有好的概念。我明白，纳粹轻蔑地反对西方民主不会是正确的。但我对民主制如何起作用，或一个法治国家应当怎样组织，缺乏具体的了解。”

且不提纳粹的肆无忌惮，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鼠目寸光以及经济的混乱，上面这段话却说中了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一个原因。20年代的民主缺乏根基。许多德国人没有或许也不会感到他们与民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又何从在政治上引导自己的孩子呢？

另外，施密特一家还有一个长期以来只有很少人知晓的隐私。当施密特谈到，他父亲很谨慎可能事出有因时，他没有继续深谈下去。事实是，古斯塔夫·施密特有充分的原因。他的父亲，即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祖父，是犹太人。

赫尔穆特·施密特大约是在1935年或1936年——具体时间他也记不清了——才知道他的身世的。当时，母亲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那个他从前一直当成是祖父的人，不是他真正的祖父。她告诉他，他有犹太血统，要他发誓不要外传。父亲古斯塔夫当时对他的儿子们守口如瓶，自然更不会告诉别人。假如真情暴露，他可能要被送进集中营。这样他的一家也会遭殃。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结。值得把它讲完，因为它不仅突出地

反映了施密特一家的情况，而且也是纳粹统治下德国的一个缩影，它说明了当时国家是怎样闯入最隐匿的私人家庭生活，而又不总是万能的。

当战争还在进行时，赫尔穆特·施密特就从东线返回故里，目的是同洛姬·格拉泽尔成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旁的证明外，他还需要一个文件，证明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雅利安人血统。这是纳粹为保证德意志人种“纯净”而采取的措施之一。他到父亲那里，第一次同父亲谈起他的“真”“假”祖父。古斯塔夫·施密特证实了这段故事，并补充说，他本人是私生子。所以，纳粹无法弄清到底谁是他真正的父亲。古斯塔夫·施密特拿出一个盖有卐字图章的文件，上面注明：“父亲不详”。

这个文件至少可以暂时防止进一步追查施密特家庭的历史。但它看来还不足以使赫尔穆特·施密特完婚。这位年轻的士兵必须带上新娘去见他的上司，由上司证明，为结婚所必需的证件正确无误。无巧不有，施密特的上司，库特·安德森中校当时驻扎在波恩。于是，赫尔穆特·施密特便第一次来到了后来的联邦德国首都——他30年后任总理的地方。那时的波恩是一个亲切的、睡意朦胧的大学城。它丝毫不曾料到，命运竟赋予它历史性的伟任。

施密特和洛姬忐忑不安地乘车去找驻在波恩南部维纳斯山上的安德森。他会承认他们的证件吗？如果他不承认，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施密特带着讽刺意味的微笑回忆说：“安德森是一个严厉的上司，但他不是纳粹分子。我的上司没有一个是纳粹分子。”安德森瞟了一眼证件，便在一个盖了印章表明施密特已向他证明了自己的雅利安血统的表格上签了字，并欢快地祝愿这对年轻夫妇万事如意。

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得知他有犹太血统之前，就已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如同全国其它成千上万个组织一样，1934年纳粹扩大并巩固其政权时，他的赛船俱乐部也被“划一化”了。小伙子



们头一天还为他们的俱乐部划船，第二天就为元首划船了。

由于艺术的原因，施密特陷入了同纳粹的直接冲突。可能象他说的那样，他对民主没有“具体的概念”，但他知道，他崇拜哪些画家。他们主要是德国表现主义。40年以后，他可以在联邦总理府的墙壁上展示他们的作品——埃米尔·诺尔德、弗朗茨·马尔克、奥古斯特·马克和凯绥·珂勒惠支的画。而纳粹认为，这些画家都是些“变态人”，他们的作品偶尔可用来作为艺术和道德堕落的典型展出示众。赫尔穆特·施密特则认为这种看法荒谬之至，且直言不讳，这可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担忧，他们急切地劝他三缄其口，不要喋喋不休地发表议论。他幸免大难加身。直到1936年，他在赛船队队友聚会的房间——他们在那里唱他们的歌曲——墙壁上写了一条要自由的口号。他当即被中止了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资格，但这却使他，如他现在所说，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离纳粹的直接影响远了一步；但同时，他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感到不寒而栗。

即便纳粹当局已经考虑对他采取进一步措施，然而，他们并未加以付诸实施。又过了一年，施密特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接着服兵役。他要走的道路似已为他安排好了。他退伍还乡时，本应不满21岁。那样，1939年底，他便可以开始攻读建筑学了。

但是，当他1937年被分配到某防空连时，也是长期服役开始之际，它历时8年，其中6年是战争时期。从此便开始了他终生同军事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从50年代和60年代作为议员，70年代初作为国防部长，以及当上总理后直至80年代。

战争的头两年，施密特是在相对的平静中度过的。他驻扎在不来梅，离汉堡只有一个小时的火车路程。1941年，他晋升为少尉，被分到一个坦克师的防空部队服役，并调往俄国前线。大约40年以后，他作为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接待，他批评俄国人入侵阿富汗，他还同苏联最高级的导弹专家们长时间地讨论战略